

DOI:10.16366/j.cnki.1000-2359.2021.04.04

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研究

余 涛, 张宏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 西亚非洲研究所, 北京 100101)

摘 要:“中非命运共同体”来源于“命运共同体”,是对“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种细化与“淬化”。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对中非过去和当前友好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它要求中非人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它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并指明了方向。当前我们应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加强对中非关系的建设,以便形成中非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感情共同体和防护共同体等共同体,从而最终实现“中非命运共同体”。在中非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命运共同体”一定会实现。

关键词:全球治理;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余涛(1978—),男,河南驻马店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非洲政治研究;张宏明(1959—),男,北京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非洲大国关系和非洲政治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2016XMZ046)

中图分类号:D8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21)04-0038-08 **收稿日期:**2021-04-05

一、引言

自从2013年3月习近平在访问坦桑尼亚时提出“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①以来,许多学者便围绕着“中非命运共同体”展开了各式各样的研究。例如贺文萍通过对近年来尤其是近五年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描述,说明了“中非命运共同体”正在形成^②;吴传华在对中非历史和现实等有关情况交代的基础上阐述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地位、典范作用和世界意义^③。另一方面,“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在全球治理的国际背景下,如何去实现或者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可以说直到今天,学者们对这些问题仍在思考。有鉴于此,本文将从“命运共同体”及“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来源与基础出发,在对“命运共同体”的产生和发展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寻“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与实践路径等,以期能够对中非关系的发展和“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作出微薄的贡献。

二、来源与基础:“命运共同体”的细化与“淬化”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建立在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和认识基础之上的^④。因此在对“中非命运共同体”进行探讨之前,有必要首先对“命运共同体”进行一个相应的分析。但另一方面,笔者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59页。

② 贺文萍:《“中非命运共同体”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国际展望》,2018年第4期。

③ 吴传华:《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地位、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

④ 此句话包含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从词语的构成上来说,“中非命运共同体”的词语基础是“命运共同体”;二是从提出的时间上来说,先有“命运共同体”(2012年)而后有“中非命运共同体”(2013年),“中非命运共同体”可以看作是“命运共同体”思想的一种细化与“淬化”。

经过整理后发现,迄今为止对“命运共同体”的理解也存在一定的“纷争”。例如李爱敏认为“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初由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倡导并推动的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际主义价值理念和具体实践”^①;而徐进、郭楚则认为“命运共同体”是“一组新型的战略伙伴关系集合”和“一个过程性概念”,它“必须反映中国特色,突出中国作为‘命运共同体’推动者的作用”等^②。因此笔者在对上述研究成果进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认为要理解“命运共同体”首先需要把握住以下几点。

(一)“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理解当前形势和人类社会构成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一种正确论断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伴随着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和贸易的往来,人类从整体上进入一个彼此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交往更加频繁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繁荣,“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③;在这个时代,疾病、战争、环境、卫生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因素将人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许多国家和地区往往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此外,从人类社会的构成与发展规律来看,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自然、人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多种要素组成的“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相互依存”的有机体^④。在这个有机体中,各个要素之间都是彼此联系、相互作用的。同时随着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⑤。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在十八大上高瞻远瞩,在深刻理解当前形势和人类社会构成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之后,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推动下,“命运共同体”又得到进一步的细化与推广。2013年,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指出:“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⑥201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再次指出:“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⑦此外,针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情况,习近平又先后提出了“中非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中巴命运共同体”(2014年2月)、“中阿命运共同体”(2014年6月)和“中拉命运共同体”(2014年7月)等概念,“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全面深化。

(二)“命运共同体”来源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

首先,作为一种由中国提出并向全世界推广的思想,“命运共同体”来源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例如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曾说过:“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⑧其弟子有子也曾说过:“礼之用,和为贵。”^⑨史伯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⑩荀子认为:“万物各得其和而生,各得其养而成。”^⑪这些都与当前“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和谐”或“以和为贵”的思想相同。此外,在中国古代文人所推崇的“责任”等思想中,也充分体现了“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天下情怀”。例如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曾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⑫顾炎武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⑬林则徐也说:“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⑭这些都与“命运共同体”所体现出来的“天下情怀”相一致。

① 李爱敏:《“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本质、基本内涵与中国特色》,《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6年第2期。

② 徐进,郭楚:《“命运共同体”概念辨析》,《战略决策研究》,2016年第6期。

③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全文),<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324/c1024-20892661.html>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4页。

⑥ 习近平:《共同创造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人民日报》,2013年4月8日。

⑦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http://cpc.people.com.cn/n/2015/0903/c64094-27543286.html>

⑧ 《论语》,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199页。

⑨ 《论语》,张燕婴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

⑩ 《国语》,陈桐生译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573页。

⑪ 《荀子》,安小兰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第111页。

⑫ 陈昌丽,刘陈姣:《习古知今 领导干部经典古诗文读本》,贵州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30页。

⑬ 顾炎武在他的《日知录》中曾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梁启超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字。参见汪仲华:《向圣贤致敬 悟人生境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87—88页。

⑭ 周轩,刘长明:《林则徐选集》,新疆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07页。

其次,“命运共同体”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一脉相承。马克思认为,作为人类基本存在方式的“共同体”主要有三种形式,即“天然的共同体”“虚假的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①。它们之间又共同构成一个层级递进的过程。其中在“虚假的共同体”阶段,由于“人们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②等原因,人们最终将过渡到“真正的共同体”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③，“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④。也就是说,在“真正的共同体”阶段,人与人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平等,个人与共同体之间也已消除了异化与对立的关系,进而共同体不再对个人的劳动产生任何的束缚与限制,人类进入一个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这恰好与“命运共同体”的逻辑相符。

(三)“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等提供了“中国智慧”并贡献了“中国力量”

所谓“全球治理”,简单地说,就是“在具有约束力的国际制度和规范框架内,各种不同的行为者,通过协商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生态和安全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全球共同利益和秩序”^⑤。就当前的情况来看,许多国家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着经济赤字严重、单边主义和治理机构困境加剧等一系列的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现有的治理体系主要是以西方大国为中心,未能及时地反映世界的发展变化等^⑥。而以“和谐”文化为主题的“命运共同体”在兼顾人类长远利益与当前利益、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的基础上可以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有效的解决路径——在“命运共同体”的“指引”下,全世界人民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加高效、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同时在生态与安全上,“命运共同体”着眼于各国人民共同的和不同的需要,倡导共同、综合和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这就为全世界人民铺就了一条共商、共建、共享的安全之路,并有助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治理系统^⑦。

其次就国家间关系来说,“命运共同体”提倡将全球各国放到一个“共同体”中来考虑,这将有助于打破国家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之窠臼,使得人们在思考问题时不只是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或地区利益出发,从而避免世界大战和类似于新冠肺炎等人类流行疾病的大暴发^⑧。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将人类的共生共长作为其重要内容,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包括全球治理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等在内的一些全球性的发展难题,从而使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团结与紧密。因而从这一角度来说,“命运共同体”为全球治理和国家间关系的处理等提供了“中国智慧”并贡献了“中国力量”。

三、历史与现实:全球治理背景下的“中非命运共同体”的主要内涵

在对“命运共同体”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

(一)“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对中非过去和当前友好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

从历史上来看,中非之间的友谊可谓源远流长。根据有关资料显示,早在公元前10世纪中非之间就已经有了间接的贸易往来^⑨。及至新中国成立后,中非之间更是开启了相互交往的“新纪元”。例如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在争取独立的阿尔及利亚等国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等给毛泽东发来贺电,祝贺新中

① 迄今为止,在对马克思共同体的划分和称法上,通常有三段论或四段论、“天然(虚假)共同体”或“自然(虚幻)共同体”之别(具体参见徐丽葵:《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现实与未来:基于马克思主义当代解释力的视角》,《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邵发军:《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的阶段性问题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11年第2期等)。但笔者认为这些只是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理解,其称法更不能从本质上影响马克思有关共同体思想的表达。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⑤ 陈家刚:《全球治理:发展脉络与基本逻辑》,《国外理论动态》,2017年第1期。

⑥ 孙吉胜:《“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全球治理:理念与实践创新》,《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9年第3期。

⑦ 张鹭,李桂花:《“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全球治理的挑战与中国方案选择》,《社会主义研究》,2020年第1期。

⑧ 笔者认为类似于新冠肺炎等人类流行疾病的暴发与全球各国为了自身的私利而相互争夺密不可分。换言之,如果有关各国在疫情暴发的过程中积极行动起来,将人类社会发展的福祉放在第一位而共防共治,疫情一般不会在其国内大规模地暴发起来,更不会在国际上得到广泛性的传播。

⑨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页。

国的成立并认为中国的胜利对北非各国反对法国的殖民统治来说是一个“有力的鼓励”^①；1950年毛泽东致电“南非印度人大会”书记梅尔，表示完全支持他们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等^②。

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20世纪70年代是中非交往的一个小高潮。例如1958年中国与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建交，1960年中国与加纳和马里建交等。截至1976年年底，中国已与非洲48个独立国家中的41个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③。此外在从1963年12月到1965年6月一年多的时间内，时任中国总理的周恩来三次访问非洲^④；从1964年5月到1976年年底，非洲共有26个国家的31位领导人访问中国^⑤。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变化和外交政策的调整，中非之间原来那种在国际舞台上相互扶持、相互支撑的“兄弟论”时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以在经济技术领域内的平等合作为主。在这一阶段，中国在与非洲“经济合作”的理念下，逐步调整各种经济架构，将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等结合起来努力促进中非之间的共同发展^⑥，中非之间的友谊在这种合作中进一步的加强。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中非之间已经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国、全天候的“伙伴”或朋友等。例如2019年中非之间的贸易额为2087亿美元，中国已经连续十一年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国^⑦；截至2019年9月，中国已与非洲54个国家中的53个建立了外交关系^⑧。就文化来说，截至2020年10月，中国已经累计向非洲国家提供了约12万个政府奖学金名额，与非洲46国合建了大约61所孔子学院和48个孔子课堂。在此基础上中非双方更是建立了约150对友好城市关系，34个非洲国家成为中国公民的组团出境旅游目的地等^⑨。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2020年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对非全行业直接投资的流量仍然达到了28亿美元，同比增长0.04%^⑩。同时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非洲的多个国家驰援中国，向中国提供口罩和护目镜等医疗物资并进行现汇支持。之后在非洲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政府也及时地向非洲派出了自己的医疗队并向非洲多个国家提供了多批抗疫物质援助。许多中国企业在非企业更是积极踊跃地为非洲国家捐款捐物，帮助非洲有关国家渡过难关^⑪。

（二）“中非命运共同体”要求中非人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首先，在当前的国际社会里，任何两个相互合作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利益都不能完全对等，对于中国和非洲来说也不例外，中非两方在诸如气候变化、联合国改革等问题上的立场也并非完全相同。但另一方面，中国与非洲有关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⑫，因此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中非之间更容易在国际舞台上找到共同的利益交会点，这就使得中国在与非洲有关国家合作时“求同存异”成为可能并且在大多数的情况下相对符合双方的利益。

其次，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社会多极化的发展和世界民主力量的加强，国际社会中原有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虽有所减弱，但以“单边主义”和“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一些“霸凌主义”仍然存在并且很有可能

①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8页。

②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19页。

③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5页。

④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9—240页。

⑤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⑥ 龙小农：《从“兄弟”到“命运共同体”：中国建构对非洲话语体系的理念与实践》，《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⑦ 戴兵：《二十载耕耘结硕果 新时代扬帆启新程：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中国投资（中英文）》，2020年Z2期。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日期简表，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2193_674977/

⑨ 以上数据是根据中国外交部非洲司司长戴兵的文章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发言整理而得。具体参见：戴兵：《二十载耕耘结硕果 新时代扬帆启新程：纪念中非合作论坛成立20周年》，《中国投资（中英文）》，2020年Z2期；外交部：携手打造文化共兴的中非命运共同体，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7/content_5555161.htm

⑩ 新时期中非经贸合作迎来发展新态势，<https://www.fmprc.gov.cn/zfhzlt2018/chn/zfgx/jmhzt/t1863839.htm>

⑪ 2020年上半年中非经贸合作综述，<http://swj.xjbt.gov.cn/c/2020-09-28/7375605.shtml>

⑫ 习近平，开启中非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代——在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开幕式上的致辞，<http://news.12371.cn/2015/12/04/ARTI1449241797073614.shtml>

在将来的一个时期内长期存在。例如“特朗普走了,‘特朗普主义’还在”^①,拜登上台后,美国仍然对中国实行强硬的贸易政策,试图通过对中国有关企业和技术的打压来确保其在全球发展中的领先地位等^②。此外,从更长远来看,自从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不断推出“人权高于主权”“人道主义干预”等论调,企图以“人道主义保护”为幌子推行“新干涉主义”。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叙利亚和利比亚危机为代表的一些国际问题才变得更加复杂并最终成为当前国际社会“挥之不去的痛”:许多利比亚难民流离失所,缺少食物和水等基本的生活物资^③;叙利亚更是陷入各方力量争夺战略空间和势力范围的战争僵局^④。因此,“命运共同体”要求中非在国际社会中更多地“礼让谦和”,争取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团结一致,从而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三)“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树立了榜样并指明了方向

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在过去还曾经与非洲以外的其他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过较为亲密的联系,并且其亲密的程度甚至于还曾经一度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国和非洲。例如中国和日本、中国和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等。但由于种种的原因,最主要的是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所导致的各种落后,中国在与这些国家打交道的过程中被超越,有些甚至于超越中国后反过来又对中国发起了侵略性的战争——中国在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交往的过程中出现了裂痕。新中国成立后,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本着“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原则,在同旧的不平等外交彻底决裂的基础上先后与苏联、印度、英国和法国等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另一方面,就中日、中印以及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关系来说,自从新中国与其建交后,双边关系进行得并不顺利。

就中日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说,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其症结主要在于日本在历史上曾经“把中国作为模仿的对象加以学习”,“当发现崇拜的对象越来越多的破绽和漏洞时”,它开始产生“脱亚入欧”的心理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孤僻心理和肆意举动。同时日本还是一个岛国,它相对优越与安全的自然环境以及平和发展对他们的民族性格与行为产生了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唯美国马首是瞻,竭力做美国反华的“排头兵”^⑤。就中印以及中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或地区之间关系来说,影响中印关系发展的主要是边界领土争端问题、西藏问题、中巴问题和安全问题^⑥,影响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东盟)之间关系发展的主要因素是机制化的合作、南海问题和美国的“印太战略”等^⑦。

但正如前所述,与非洲相比,这些国家和地区许多都曾经与中国有过较为密切的联系。例如中日原本是一衣带水的好邻居;中国和印度在历史上都曾经是文明古国,都曾经在近代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就中国与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来说,双方很早就开始了文明交流互鉴,在近代更是有着休戚相关、患难与共的历史命运^⑧。因而在“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下,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之间还有可能再次成为好邻居、好朋友与好伙伴。

值得提出的是,自从“命运共同体”提出后,在日本等国确实也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例如2019年,印度尼西亚赫鲁大学的斯里坎特·孔达帕利在赴华出席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前表示,中国需要让其他亚洲国家相信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害处、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亚洲各国都有利^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称日本民众没有忘记2011年日本大地震时得到了中国

① 崔屹鸣:特朗普走了,“特朗普主义”还在, <https://news.bjd.com.cn/comment/2021/01/22/44678t112.html>

② 胡锡进:拜登政府宣称:“将用一切可用工具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做法”, <https://news.ifeng.com/c/84IlzvuPECm>

③ 阮宗泽:《负责任的保护:建立更安全的世界》,《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3期。

④ 叙利亚危机 战事僵局短期难以改变, <http://news.12371.cn/2013/09/23/ARTI1379891205167430.shtml> from=groupmessage

⑤ 吴小珊:《中日关系的“症结”及其原因分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⑥ 张敏秋:《试析发展中印关系的几大障碍》,《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4期。

⑦ 刘喆:《“百年变局”下的中国与东盟关系》,《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

⑧ 何祖坤,林延明:《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南亚东南亚研究》,2020年第3期。

⑨ 印度专家: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亚洲各国利益, https://www.iqiyi.com/w_19s7mcvlnh.html

的很多帮助;“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希望所有人都能渡过难关”,“各国应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总之,这些情况说明,在“命运共同体”的影响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系有可能更加紧密。

四、治理与建设:“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关于“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在现有的研究中已有许多不同的见解,例如李雪冬、王严认为由于中非命运共同体涉及全球治理等众多领域,需要全方位、复合型的行动计划和实施路径,因此提出“八大行动”,并“结合中非合作的实践经验与非洲实际情况”,“更加注重能力建设和内涵发展”^②。武涛认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绝非纸上谈兵、口头上说说而已”,“中非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双方的携手合作”,具体说来它可以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的平台机制”“‘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和“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合作体系”等三个路径来实现^③。但就本文而言,笔者认为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政治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争取建立中非责任共同体

首先,所谓的“责任共同体”,在这里主要是指中非双方为了维护自身或对方的利益,在国际上所达成的一种共识或默契。其次,从历史上来看,中非之间很早就已有过类似的行为。例如1956年,在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中国坚定地站在埃及一边,对英法入侵埃及的行为给予了强烈的谴责^④;1958年,当中国的台湾海峡出现紧张局势时,埃及的和平委员会表示他们志愿支援中国解放台湾、金门、马祖及其周围岛屿的斗争等^⑤;1971年,正是在广大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才能得以重返联合国并且顺利地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

此外,从现实的角度来说,中非两方也都是非常需要这种理解与支持的。如前所述,中非双方都是发展中国家,彼此之间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等。但另一方面,中非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意见并非完全一致。因此面对西方的霸权和中非之间的分歧,中国和非洲有关国家更应该在国际上相互理解、相互支持。

因此,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角度来说,中非两方必须在政治领域内相互理解、相互支持,只有这样才能构建“中非责任共同体”,从而进一步实现“中非命运共同体”。

(二)经济上加强交流、互通有无,争取建立中非利益共同体

虽然中国和非洲都是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上却有着很强的互补性。这是因为对于广大的非洲国家来说,由于它们大都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对钢铁、水泥的需求旺盛,而中国在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相对富余的产能,因此非洲希望能从中国引进先进富余的产能,从而加快其自身的产业发展^⑥。同时对于中国来说,“非洲丰富的农矿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尚待开发,中国需要非洲的资源”^⑦。因此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济合作时存在着巨大的空间。

但另一方面,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济合作时又存在一定的困难。例如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大陆,非洲的生产力水平整体偏低,因而中国从非洲进口的多为能源矿产品,中非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工业制成品—能源矿产品”单一型贸易结构^⑧。近年来随着中国对非贸易的顺差不断增大,中非在未来的贸易中也存在一定的摩擦可能性。

因此中国在与非洲进行经济合作时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情况下,中非在进行经济合作时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加强交流、互通有无,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合作共赢的中非利益共同体。具体来说中国可以以对

① 鸠山由纪夫:《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20年3月2日。

② 李雪冬,王严:《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意义、内涵与实现路径》,《非洲研究》,2019年第1卷(总第14卷)。

③ 武涛:《中非命运共同体:理论内涵、实践路径与时代意义》,《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

④ 陆苗耕,黄舍骄,林怡:《同心若金——中非友好关系的辉煌历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158页。

⑤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8页。

⑥ 汪巍:《中国与非洲国家产能合作的特点和趋势》,《经济师》,2019年第10期。

⑦ 张忠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基础、挑战与路径》,《中国战略报告》,2018年第2期。

⑧ 柴巧燕,丁晓钦:《利益共同体视域下的中非经贸合作:成就、挑战与前景》,《海派经济学》,2019年第3期。

非援助为抓手,以“一带一路”为桥梁,大力鼓励中方企业和有关人员赴非投资。同时对于非洲各国来说,应该在保障中方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快自身的民主化改革,从而为中方的投资创造更好的环境。

(三)文化上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争取建立中非感情共同体

所谓文化,在这里主要是指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它在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中起到重要的桥梁作用。对于中非来说也不例外。中非之间其实很早就已开始了这一方面的交流。例如早在公元前1000年,埃及就已开始使用中国的丝绸^①;大约从公元前二世纪末,非洲的一些医药传入中国^②。

新中国成立后,中非之间的这种文化交流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例如早在万隆会议期间,中国和埃及就曾就两国的经济和文化问题进行过专门的会谈;1956年,中国的文化艺术代表团访问埃及等三国并受到三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③;1979年,埃及的文化代表团访问中国并签署了中埃文化合作协定执行计划等^④。笔者有幸参加过一次由共青团中央等联合主办的亚非青年论坛。在整个的活动中来自亚非的青年相互学习、互相讨论^⑤。中非文化交流的热度和深度由此可见一斑。

因此在笔者看来,在“中非感情共同体”的驱使下,中非可以继续加强在文化方面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取长补短、相互借鉴,从而进一步提高中非人民相互了解的广度和深度,最终建立“中非命运共同体”。

(四)安全上彼此依靠、相互支援,争取建立中非防护共同体

根据国内有关学者的研究,中非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展开了安全方面的合作。例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尽管中国还处在极其困难的情境下,但仍向阿尔及利亚、几内亚等非洲国家提供了军援;1958年12月阿尔及利亚军事代表团访华时要求中国给予军援,中国政府同意了阿方的要求^⑥。

但由于新中国成立后的中非合作多为特定背景下的中国对非援助,因此中非之间真正意义上的安全合作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例如1989年中国派出20名文职人员到纳米比亚参加由联合国组织的“过渡时期援助团”^⑦;1991年又派员参加“联合国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⑧;2008年,在位于非洲之角附近的亚丁湾地区索马里海盗活动猖獗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再次派出一支由3艘舰艇和数百名官兵组成的舰队,远赴亚丁湾执行护航任务^⑨。总之,在中非平等的基础上,中国向非洲派遣了大量的维和人员,中非之间的安全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后得到了迅速发展。

中非之间的安全合作反过来又为中非关系的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中国在非洲参与的和平与安全建设行动“推动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发展与非洲自主维和能力的提高”“为缔造非洲发展建设所需要的和平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直接推动了非洲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⑩。因而在“中非防护共同体”的命题下,中国和非洲有关国家可以在原来安全合作的基础上继续谋篇布局、加强行动,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中非安全合作的良好局面,从而最终形成“中非命运共同体”。

五、结语

总之,在全球治理的背景下,“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主要有三个,即“中非命运共同体”是对中非过去和当前友好关系的一种真实写照,它要求中非人民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争取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同时它也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关系的发展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认为实现“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主要有四个,即要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安全等方面

①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② 沈福伟:《中国与非洲——中非关系二十年》,中华书局,1990年,第174页。

③ 艾周昌,沐涛:《中非关系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

④ 基本概况,http://eg.china-embassy.org/chn/zaigx/whjl/448898/

⑤ 参见亚非青年创业论坛:青年合作是亚非发展的积极推动力,http://shareapp.cyol.com/cmsfile/News/201910/18/web282028.html

⑥ 徐伟忠:《中国参与非洲的安全合作及其发展趋势》,《西亚非洲》,2010年第11期。

⑦ 张小明:《从“文明标准”到“新文明标准”——中国与国际规范变迁》,九州出版社,2018年,第185页。

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编辑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1999》,上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年鉴社,2000年,第69页。

⑨ 护航军舰行军揭秘,http://epaper.southcn.com/nfdaily/html/2008-12/25/content_6712269.htm

⑩ 王学军:《中国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建设的回顾与反思》,《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1期。

加强对中非“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感情共同体”和“防护共同体”的建设^①。只有做到了以上四点,“中非命运共同体”才有可能实现。

展望未来,“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建设道阻且长。除了上文中所提到的一些因素外,西方国家对中国和非洲的“围追堵截”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例如从 2006 年开始,西方的一些政客、媒体将“新殖民主义”的帽子扣到中国的头上^②;美国一些决策者经常将中国视为非洲民主的威胁、美国经济利益损害者和地缘政治利益的挑战者^③。因而在“中非命运共同体”实现的过程中,中非之间必将还会面临着许多的艰难险阻甚至于“激流险滩”。但笔者相信,历史的车轮终究是向前的,在中非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非命运共同体”一定会实现。

Research on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Governance

Yu Tao,Zhang Hongming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Beijing 100101,China)

Abstract:“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comes from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which is a refinement and “quenching” of the though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governance, “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 is a true portrayal of the past and current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it calls for the unity of the Chinese and African people on the basis of seeking common ground while reserving differences, and striving for a more just and reasonable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sets an example and shows the direc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or regions. At present, we shoul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in areas of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 and security to form a community of shared responsibility, common interests, mutual feelings and mutual defens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so as to finally realize the formation of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Chinese and African people, the “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must can be realized.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China-Afric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责任编辑 张家鹿]

① 在对这些“共同体”的命名上,笔者思忖良久,最后结合着领导人讲话(重点是习近平讲话)和现有的研究,将这些共同体分别命名为“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感情共同体”和“防护共同体”。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命名本身并不重要(切不可简单地望文生义),重要的是这些“共同体”本身所蕴含的内容或涵义。

② 孙勇胜,孙敬鑫:《“新殖民主义论”与中国外交应对》,《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5期。

③ 张宏明:《大国经略非洲研究》(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469—470页。